

N 本期聚焦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新特征

徐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以这一主要矛盾转变为依据，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重点和改革取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呈现一系列新特征。站在发展新起点上，我们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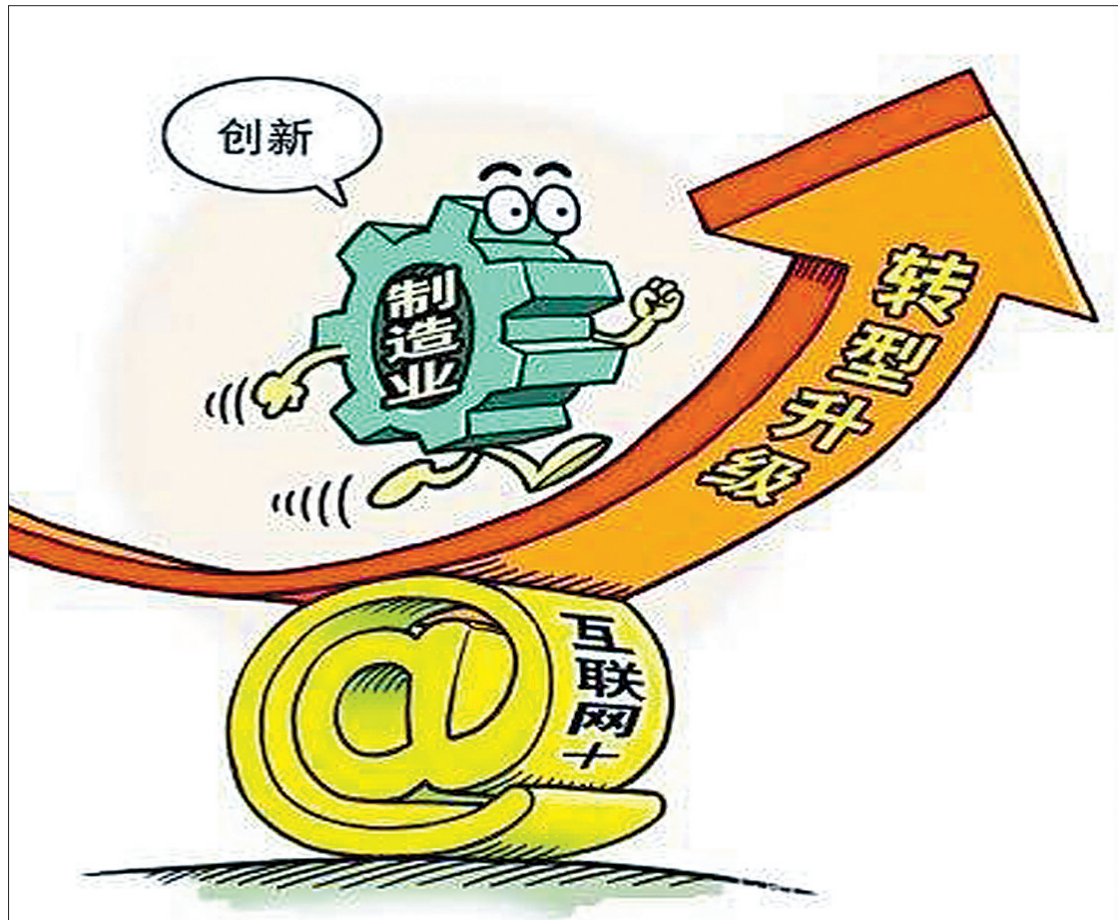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是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持续低迷，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变化，过去10年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制造业成本优势快速减弱；三是更多新兴经济体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吸纳制造业投资，加入了世界市场竞争；四是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加快，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制造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更加突出，国内供给侧还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需求、高端制造品需求、高品质服务需求等高端需求，外溢到海外市场。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到国外采购消费品和优质食品，并到海外留学、旅游、就医等。

上述发展条件变化，使我国原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制约。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表述，主要内涵是：

一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位，22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但质量效益不高、增长动能



新华社发

薄弱的问题变得日渐突出。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为目标，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创新和创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效率提升，提高供给侧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实现更高质量和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二是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本之间协同发展、互相支撑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要强化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更好发挥国家在基础研究以及应用基础研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服务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便捷、成本合理、品种多样的融资服务，特别是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服务；强化人力资本培育，为实体经济升级提供更多具有更高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劳动力。

三是加快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有效就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

序、企业优胜劣汰，这是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增长必备的体制保障。微观主体有活力就是要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好企业经营决策自主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培育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深化供给侧改革乃根本解决之道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任务，这是针对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根本解决之道。

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总体上我国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依然不适应需求升级和精细化要求，产业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以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为重点，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存量供给品质，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要鼓励各行各业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不断增强经济的质量优势。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围绕中高端消费需求，在创新引领、绿色低

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提升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水平，提高传统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要继续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要完善房地产调控措施，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结构。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整体债务杠杆率，特别是要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补短板方面，要强化重点地区重要污染物排放的防控和治理，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进一步健全扶贫脱贫长效机制，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完成已经明确的脱贫目标和任务，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企业家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推动创新发展的主力军，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法治，更好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使他们植根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要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形成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作者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来源：经济日报

N 学者观察

怎样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基本国情

陈晋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怎样理解这里说的“变”与“不变”的关系？

这首先涉及到怎样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国情和作为社会性质判断的基本国情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说的国情，主要指国家面貌和时代特点，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我们这些年常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情所发生的变化。

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的。经过努力奋斗，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转变，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漫长历史过程，有一百余年。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起码有“上百年”的时间，这是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国情依据，也是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历史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也相对稳定，但比较起基本国情来，则容易变化一些。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

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

据此，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强调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比较理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虽然表明基本国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变化，但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变化，是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深入全面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变”与“不变”的关系，要求我们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就在于能够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在时代一道前进的过程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

观点集粹

治国理政的哲学境界

辛鸣在《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和辉煌成就，从根本上来讲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坚持、自觉运用与切实实践。把人民至上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用“以人民为中心”书写历史主体的实践自觉；以创新为魂激发治国理政的澎湃动力，在自我革命

中实现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用不忘初心守护治国理政的精神家园，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贡献中国方案传递治国理政的天下情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世界和谐繁荣进步。这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知行合一，既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远境界，又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金融科技要带有温度

董希森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本质仍然是金融，服务对象还是客户。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是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满足金融消费者日益多元的需求，这是金融科技应有的态度和温度，也是对社会各方的约束与要求。对从业机构而言，要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比如在发展非现金支付的过程中，要为中老年人和低收入者提供新知识、新

技能的培训和指导，尽可能帮助他们融入数字社会中来，享受到科技红利；充分尊重公众日常习惯，由公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支付结算方式；增强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真正有所敬畏。面对不断出现的个人信息泄露等现象，要从制度、技术、流程等多方面加以改进，切实维护好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最重要的是，对新技术保持一份冷静，新产品研发应在便捷性和安全性上找到平衡点，如此才能行稳致远。

社保体系建设的三大取向

郑功成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刊文指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如下取向：一是责任分担将从失衡状态逐步走向均衡。二是补齐社保短板并构建正常的待遇调整机制成为必要。如进一步健全低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真正兜住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民生底线；同时抑制个别地区超水平的福利

冲突，避免短期福利政绩工程留下不良的后遗症。三是维护社会保障保基本的原则，留出相应的空间让商业保险公司及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慈善组织发挥作用。可以预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并按照共建共享、互助共济原则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

N 学有所思

智库专家纵论“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丰富内涵？怎样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改革关键期，面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等重大问题，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 and 综合国力等

课题，都亟待解决。”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建议，要大力加强高水平智库建设，架起“知”与“行”互联互通之桥，提供更多务实管用之策。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看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一个方针，即“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坚持一条主线，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大变革，即“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一个产业体系，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即“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新“巴山轮”论坛执

行主席兼秘书长曹文炼认为，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就要更注重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等社会领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前提下作出的战略部署，对此，要坚守新发展理念不放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强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把着力点放在结构上，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提示，要警惕当前经济发展中“脱实向虚”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消除，发展金融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

建议，在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过程中，要找到经济增速与人民币长期信用间的平衡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跨越以往的一些结构调整思路，不应当就市场谈市场，就经济谈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培养市场主体，而在于加强政府的权力约束以及按照新时代党建思想强化党的领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注重人民福祉的增进，注意引导人们的观念从勤劳致富向适度享受转变。要着力实现全民社保，消除城乡差距，下大力气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来源：光明日报